

回想起来，我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应是从从小就有的。小学的时候老师有教课道具的需要，我都积极提供，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张中国地图，以至于现在家里墙上就只剩一张世界地图了。初中的时候有保卫钓鱼钩的游行，在牡丹广场，我本来去上辅导班，路过看到，就伸着头让人在我脸上盖了个章，加入了游行队伍。高中毕业的时候呢，秉持着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的信念，我决心奉献。本科的时候呢，视野开阔了，没那么好骗了，学会了“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只听一半，知道了价值才是硬通货，停止了自己没有价值的奉献。

但可以说我还是不忘初心的吧，16年在主席面前说科技报国是真诚的，17年中关村特楼重温他们的故事是情难自禁的，18年校庆的主题挎包我现在还背着用来在长途旅行时装贵重物品，我记得科教报国六十年，19年在鹏城实验室参加国庆活动的照片现在是我 LinkedIn 的头像，国旗在照片中央。可是伴随不忘初心的还有牢记使命的副作用，我嫉恶如仇，跟餐馆讲食品安全法，跟理发店讲消保法，对违停拍照举报；我关心社会问题，微博热搜，知乎热榜，我关心远方的人们。其实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应该不是副作用，虽然我愤怒，我痛苦，但我乐在其中，相信这是使命，也相信我的斗争会让她变得更好。

后来我去悉尼读了博士，这两年我过得挺快乐的，拿着澳洲发的钱，做自己的科研，开车在夜里看海，周五在学校会议室玩德州扑克，和朋友讨论 idea，讨论吃什么，讨论未来发展，当然少不了讨论女孩子们。疫情的阴云几乎没有挡住一点悉尼的好天气，你永远自由，即使在封城的五个月里，有必要活动的话你还是可以合法出门，那什么是必要活动呢，户外运动，遛狗，购物。于是我们在封城中必要的去 La Perouse 看了日落。更不用提封城期间 750AUD/week 的封城津贴了，说起来这个低保标准比我奖学金还高一点。

当然这样的快乐也有代价，姑且称之为二等公民的快乐吧。诚然华人在西方国家是二等公民，但当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归属感，没有任何期待，傻叉总理又怎样，社会问题又怎样，对我的学业没有影响，对我看病购物没有影响，对我开车看海没有影响（没错人在悉尼确实就喜欢开车看海，各种各样的海），那谁在意呢。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跳出一个集体，成为一个人。我开始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兴趣，关心自己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讲，二等公民与其说是剥夺了我的一些权利，更不如说是减轻了我的负担，减轻了一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我不再关注，我不再愤怒，我不再期待，我不再痛苦，我放弃了对正义的执念。

今年开始澳洲躺平了，很难在娱乐的同时保证安全，加上两年多没回国了，我准备回国待一段时间。这也算是疫情好的一面，让我在读书的同时还能陪陪家人。毕竟小镇做题家的人生就注定了要从本科开始慢慢地失去那个小镇。

起飞前 48 小时双阴检测，起飞当天核酸检测，登机落地浦东，在防疫人员的命令下，三个小时测了核算出了关。落地五个小时后到了酒店。除了对防疫人员态度有点不爽外，毫无怨言，支持防疫。没过几天，同航班一个群友在另一个隔离酒店突然被要求全身防护服转移。后来知道这个就是华亭酒店。中央空调内循环，登机前不用检测的香港入境人员，上海爆发。为什么都是境外香港不用核酸检测不用五个一？也是，毕竟是中国香港嘛，认了。

上海隔离结束，凌晨五点到洛阳火车站，出站口需要提供 48 小时核酸证明，没有的旁边可以做。呜呜泱泱的人，昏黄的路灯，眼睛眯成一条线的查验老大爷。在老大爷查看我核酸证明的是同时，一个中年男人恨铁不成钢的叫住了准备去现场做核酸的中年女人，拿个空白的手机屏，得老大爷晃了一下，带着女人出站了。第二天醒来，洛阳发布了一例从上海来的火

车上的感染病例，又想到凌晨火车站的核算检查情况，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来了。

接通 12345，先确认了洛阳的防疫政策，然后叙述了事件，接线员说好的记录了。这就没了？我继续问：这些东西你登记了，会给谁看？谁来解决？谁会给我反馈？他比我更诧异：你还需要反馈？……也是，你说也说完了，人家也给你记录了，你怎么还问人家这个事情谁来解决，还要给你反馈呢？主人翁意识是让你奉献的时候想的，你他妈来行使权力了？

换上国内手机卡后，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开口就是我是洛阳市涧西区或者高新区防疫办或者公安局，你叫啥，身份证号，你在哪，啥时候入境，啥时候来洛阳。刚开始我就是诚惶诚恐地配合，事无巨细的说。即使同样的事情我一天要说两遍，更即使依照国务院公布的洛阳市疫情防控政策我已经完成了我应做的向社区报备。后来火车站事件发生后，应该是因为我经过火车站，辖区西工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了。对重复询问的不满加上对火车站出站检查的愤怒，自述警察自报家门后，我问你怎么证明你是警察？多日的不断重复实验，对以上问题，自述警察们大概有三种回答：

1. 涧西区某警察，努力证明自己，报姓名报警号，报我的隔离酒店，说我可以找前台确认。我认可他的努力，积极配合了。其实当时我很感动，但现在写字的时候发现我真是跑久了，我他妈的被警察想要收集我的信息而证明自己是警察的举动而感动？
2. 西工区某警察，说哎呀我就问你一些问题不是敏感信息，语气大概是你在刁难我吗那种感觉。我直接挂了。很有趣，她回答的点不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是解释问题的性质。难道问题点是在于她要问什么性质的问题吗？问题点难道不是在于是谁来问这个问题，收集这个信息吗？她认为这样辩解合适的一个假设是：只要不敏感但跟防疫相关的信息你就要告诉一个自述警察。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法必依，能比疫情大？
3. 某私人电话警察，说你这信息你要不提供就给你变黄码了，到时候你自己再去麻烦着弄吧。这算是威胁吗？还是权利就是这样用的。幸好我本身还是红码，要不然我就跪了。

我当然知道以上三人肯定就是警察，但是程序正义呢？我当然也知道电话里很难证明警察身份，但是他们该改进他们收集信息的方式呢还是我该接收这样的程序呢？接受这样程序的后果是什么呢？看看电信诈骗，人家骗子提供的东西不比自述警察们可信多了。

今天是隔离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有了在上海隔离的经验，理论上讲，核酸检测报告出了之后就可以结束隔离了，不需要卡 14/7\*24。因为我是凌晨到的酒店，而酒店为了方便是每天上午解除隔离，对我来说隔离时间超过了 7\*24，但是对于下午开始隔离的人，隔离时间不够 7\*24。在此背景下，我开始多方打听，看我可不可以在拿到核酸检测报告就解除隔离。

于是我先询问酒店，酒店回答这个你得看社区什么时候派车来接你。

于是我去问社区，社区说你问酒店，我把酒店的说法转告给社区，社区说好那五点半派车来接你。

此时我核算报告还没有出来，我特意跟社区强调这件事，说先别派车，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拿到核酸。

等待核算过程中，转运救护车打电话了，问我能不能早点走，我说我不清楚，是社区和酒店联系的，同时我也说了我还没拿到核酸，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走。

拿到核酸后，我再次和社区确认，我拿到核酸，可不可以走，社区说可以，派车了，五点半之前。我跟社区说转运救护车之前打来电话了，我说不确定，现在需要您再和他们确认一下。

我开始收东西，放歌，连蹦带跳半个小时。

转运救护车问我能不能走，我说可以走啊，社区说了可以走，救护车让我跟酒店确认，我说我无法和酒店确认，社区已经跟酒店确认了，酒店我只能打到前台，没有用。救护车开始拒绝过来，说酒店不确认我们没法去啊。我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跟酒店沟通是社区的工作，也是社区派你们来接我的，社区都说好了，我为什么要跟酒店联系，况且我联系不上。双方态度恶劣，不欢而散。

我赶忙跟社区确认，救护车让我跟酒店联系我不知道咋联系啊，社区也很生气，说已经联系过酒店了，问我要了救护车电话。

五点半，车来了，十几分钟后，酒店电话来了，说社区搞错了，隔离时间不够，走不了。挂了电话我问社区，社区说在工作群里问了五点半去接这个人可不可以，酒店说可以社区才派的车。之后就是无尽扯皮，摘几句重点吧：

我：既然你说酒店承诺给你可以来接，现在酒店跟我说不行，你能不能再去问问他为啥答应了又不行吗？

社区：你去问他为啥不行，他如果说了有原因那就是不行。

所以社区跟酒店的沟通沟通了什么呢，社区得到了酒店承诺，派车了，酒店说不行。是社区没有沟通好吗？

我：能不能走我一直就不确定，我先问了酒店又问了社区，社区又跟酒店确认说可以走，我才收拾东西，现在走不了难道怪我吗？

社区：难道怪我吗，我在群里问了这个人能不能接，说了可以我才派车的。

好，那就是酒店工作失误

我：你跟酒店的沟通记录可以发给我吗，我要投诉酒店。

社区：投诉啥，犯的着吗，你马上就可以走了，再因为这个置气，你想想是不是。

我：投诉不是因为生气而报复，是为了反馈他的工作问题，帮他改进。

社区：改进啥，忙都忙死了，谁都跟你一样闲？

当时气死我了，但现在写到这里我好想笑啊。可不是嘛，我的时间值钱吗？

必须坦白，再同酒店和社区沟通中，我使用了非骂人的语气词他妈的，以及社会蛀虫，做不好本职工作等我认为客观评价，他们可能觉得是人生攻击的词语。

后续就是我打包好了行李，跟妈妈说不用等我了，然后找朋友吐槽，后来就萌生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每个小镇做题家，父母党员，从小爱国主义教育不断，高考改变命运，大学之前没出过国，必定有一个家国情怀深埋心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观察，我思考，我愤怒，我斗争，我不气馁，我重新出发。

但你知道吧，能量守恒，正能量他也得守恒。

于是，就到这吧。

不再关注，不再愤怒，不再期待，不再痛苦，放弃对正义的执念，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至于热血是怎么凉的？

忘了。